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

张太雷原名曾让，字泰来，投身革命后取"泰来"谐音改名太雷，其含义是立志把自己化为改造旧社会的"巨雷"。1898 年，他出生在常州西门外西仓街，与母亲相依为命，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顺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在中学，他阅读了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书籍，在幼小的内心萌发了追求自由民主的主张。

追求真知，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

1915 年，张太雷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冬转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法科预科。在北洋大学就读期间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之时，马克思主义思潮随之涌入中国。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极大地震撼了张太雷的内心世界。为了进一步了解苏俄，他通过朋友的介绍，与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到中国进行革命联络活动的俄共（布）党员鲍立维建立了联系。不久，他受到鲍立维的邀请，担任了鲍立维的英文翻译。在鲍立维这里，他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帮助鲍立维翻译了不少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献，成为中国最早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熏陶的青年之一，他的世界观也由此开始由民主革命思想逐渐转向了共产主义思想。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开始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探索新的救国之路。大学期间的张太雷，率先接触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并积极投身到革命实践中。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积极投身其中，并在北洋大学成立了中国大学生最早革命团体之一——"社会改造社"，团结青年学生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 年 3 月，他加入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秘密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往来于北京、天津和其它一些地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肩负使命，参与党团组织初创

1920 年 4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等人，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建党工作给予帮助。张太雷作为维经斯基的英文翻译，参加了北京、上海的建党活动。1920 年 10 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张太雷加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他满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勇敢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张太雷是个行动力执行力很强的革命家，尤其是在建党建团的复杂工作中。从 1920 年夏天开始，张太雷直接参加中国青年团组织的创建活动。1920 年 11 月，他在李大钊指导下，建立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任书记。他为该组织起草的团章明确规定团的宗旨在于"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推动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运动，先后创办《劳报》《来报》，并分发《共产党》等革命刊物，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被誉为"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

张太雷在实际工作中特别能吃苦，在参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时，与邓中夏一同到长辛店一带开展工人运动，与工人同吃同睡，当时每月生活费只有 7 块钱，他留下 3 块钱作为伙食费，其余都用于招待工友，自己经常吃不饱。当时不仅是他个人经常人不敷出，党组织在经济上也十分困难，但他看到身边的同志需要接济时还是经常慷慨解囊，两套西装进了几次当铺，每次都得等领到新发的经费再从当铺赎回。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使者，张太雷以其杰出的才能很好地完成各项工作，加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了解，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影响，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上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宝贵贡献。

献身革命，喋血战斗火线

早在北伐战争开始的前夜，蒋介石为实现其政治野心，建立独裁统治，展开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活动。1927 年 4 月，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霎时间，中国大地乌云翻滚，针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接连发生。

张太雷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者的行径万分愤慨，同时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八七"会议以后，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和闽南等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临时中央决定派张太雷到广东工作，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南方局军委委员。1927 年 8 月下旬，张太雷一到广东，立即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究制定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并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构，同时改组了广东省委。同年 11 月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制定广州起义计划，下旬回到广州主持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组建了广州起义指挥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总指挥。

正当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起义消息被泄露。张太雷当机立断，于 12 月 10 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一天起义。12 月 11 日，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在张太雷主持下，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他任代理主席，人民海陆军委员。广州起义引起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度恐慌，他们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虽经起义军民浴血奋战，但是到 12 日下午，起义武装已经难以与敌军抗衡。张太雷闻讯，边聊乘车赶赴前线指挥战斗。车行至广州市大北直街附近，遭到敌人伏击，他身中三弹倒在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里，壮烈牺牲。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张太雷壮丽的一生犹如他的名字，雷霆般坚守信仰，顶天立地。他燃烧自己年轻的生命铸就了舍生取义的历史丰碑，用短短 29 年的生命历程践行了"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铮铮誓言，用鲜血和生命浇灌的革命精神永存于浩然天地之间。（杨凤芹摘编）

理论 微故事

恪守党的初心 密切联系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党的正确主张与群众自觉行动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性。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增强为群众服务的本领，努力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权为民所赋 权为民所用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明确，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取私利。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只有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为指导，才能制定好党的正确主张，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党的正确主张是人民群众实践的产物，是"制定党的正确主张"与"体现人民群众内在诉求"二者的辩证统一。坚持调查研究既是"制定党的正确主张"的前提，也是"体现人民群众内在诉求"的根本。坚持党的宗旨，必须保证党的决策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要真正做到决策正确，实施有力，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不断提高决策水平和能力。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赢得一切工作主动性的法宝，没有调查研究没就没有决定权，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一切。作为党员干部只有进一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泛地与老百姓"零距离、面对面、心连心"接触，真正吃透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然后经过认真总结、反复论证，才能形成党的正确主张。党的正确主张只有不断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内在诉求，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不断提高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必须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这就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干净、以身作则、模范担当，做好桥梁、纽带和模范带头作用，千方百计调动人民群众贯彻党的正确主张的自觉性，真正激发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内生动力。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坚持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判者，要不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保证各项决策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才能不断营造好"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生态环境。党的正确主张是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前提，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行动，必然是党的正确主张的内在诉求。只有不断地坚持以人民至上、人民为中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增强获得感，才能从根本上赢得群众的自觉行动。

（范义 孙文鹏）

做新时代好干部，要担当"四官"

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 7 月 9 日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

思想懒惰，精神萎靡，对党的政策不了解不熟悉，政治麻木，办事糊涂，是为昏官；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满足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为懒官；干工作没思路，遇问题少办法，占着位置不干实事，反而见问题就让、有荣誉有上，推诿扯皮、不思进取，把不会干、干不好，不好干当作实不成工作借口，是为庸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蜕化变质，是为贪官。

"四官"问题前三者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贪官更是有违党纪国法。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昏官、懒官、庸官、贪官这"四官"都要不得。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是心系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干事创业有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领导干部。

做新时代好干部，要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要求领导干部心中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既脚踩大地，又仰望星空。要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地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接受思想政治洗礼，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站稳政治立场，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做新时代好干部，要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共产党人的初心，靠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靠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领导干部必须以一往无前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夙夜为公、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来。

做新时代好干部，要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新时代面临着许多新矛盾、新困难和新任务，党员干部必须要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在实践中学习和锤炼自己，不断增强本领，提高执政能力，瞄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为群众解决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做新时代好干部，要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领导干部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这不仅是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的必需，也是树立公信和权威的必需。为政一任，当造福一方，领导干部只有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好表率，才能挺直腰杆、脊梁，赢得一方百 2 姓的信任和拥戴。

（谭敏）

儒家的生态智慧与美好家园建设

生态美学以建设世界万物宜居、美好的生存家园为研究出发点，以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环境整体为研究对象，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与生命互动。在生态美学看来，自然存在的环境本身就具有"全美"价值，而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与连续性就是美，反之就是丑。所以，人类的活动既不应以自我中心为原则来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无休止掠夺，也不应以主观审美趣味来随意破坏、改造自然，而应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存在价值基础上，遵守自然生态规律来进行活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极为注重天时、地利、人和的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一

荀子云："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儒家哲学中往往是以"天"或"天地"观念来进行阐发的。"天"在儒家哲学中具有多重意义，如冯友兰曾把中国哲学中的"天"分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等诸义。不过，中国先秦哲学的一个转变即在于对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进行了哲理化，把"天"与最高本体——"道"结合，形成了以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相贯通的天道观。"天道观"的出现表明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确立，意味着中国哲学从先秦开始就主要是以一种哲学智慧而非宗教信仰的方式来把握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存环境的连续性体验。要求人去敬守天道，遵循天道而不是去僭越天道、乖违天道，这意味着古人是以自觉的理论反思意识来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孔子一方面把"天"视为了万物生命所出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人应当对"天"有着一种敬畏的态度。儒家天道观中所涵摄的自然之天与道德义理之天的融通，将生态伦理、道德意识渗入对天地自然的认知当中。这就表明，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天"或"天地"除了今天的自然界意义外，还赋予了"天地"一种至诚悠远、博厚高明的精神含义。在儒家看来，正是有了"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至上良善、自然万物才得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这种精神含义是与古人所共识的万物同出于天道生成的天人一体观念紧密关联的，因而是精神反思性的，是道德律令式的。

二

在儒家看来，只有在与天地万物、外在环境相亲相爱的关系中，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万物生命才能得到繁荣昌盛。今天生态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毫无敬畏之心，肆意攫取与过度开发，从而破坏了天地自身的平衡稳定与和合创生。"敬则不逐物，亦不遗物。"所以，重提儒家对天地万物、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对营造美好家园、美好生态环境是极有意义的。

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与尊重，就是要具体落实人与天地万物休戚与共、荣辱一体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策略。孔子倡导仁学，他不但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而且也要人对天地万物充满仁心。《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说的就是孔子钓鱼但不用网罟捕鱼，孔子打猎但不射归巢之鸟。孔子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与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的掠夺心态是截然不同的。《孟子·梁惠王上》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时，即万物生长的自然时节。"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都表明了对自然万物的利用要尊重客观规律，推行"时禁"。"数罟"，即细密的渔网。不用细网捕鱼，目的是为了保留下尚未长大的鱼与鱼种，这也体现了一种可持续的生态观念。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在这里表达的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生态观念无疑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

当然，儒家在生态智慧方面作出系统的理论总结的当属《礼记·月令》了。《月令》作为朝廷礼制与国家律令的一部分，概述了天子一年四季的政治活动。作为古人对农耕社会生产与生活管理经验的总结，《月令》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保护、营造美好家园的生态美学思想。就基本思想而言，《月令》要求人的活动充分尊重包括植物、动物和土地等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生长、变化规律，因时而动的保护与利用各种资源。《月令》特别强调，春夏两季是万物生长季节，人的活动更是要以积极主动的行为来保护自然资源，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对于山林川泽土地等资源，《月令》提出在春夏时季要采取多项措施来保护、休养生息这些基础性资源，如禁止伐木，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伐大树，入山行木，烧薙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

人类现代文明是经由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推动造就的。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与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峻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各种生态危机也接踵而至。而中国儒家文化关于"以天地为本"的生态道德意识、关于"时禁"的生态伦理规范、关于"休养生息"的生态修复观念都有助于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余开亮）